

芬蘭國家地景中的鄉村意象

關河嘉

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以符號學的觀點分析 19 世紀以來芬蘭國家意象的建構歷程與特色。湖泊、森林、雪地和原野的自然地景，與其間座落著小木屋，此等鄉村景緻是大眾文化中代表芬蘭民族或國家的地景。然而，這表面上看似客觀形成的芬蘭國家地景，卻是民族國家認同與觀光產業發展下的展演。本文說明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湖泊、森林、雪地和原野如何成為芬蘭人民民族主義運動所凸顯的認同符號，而在當代芬蘭社會中，伴隨著芬蘭鄉村觀光產業的發展，這些鄉村地景如何不斷扮演著代表芬蘭人國家地景的過程。

關鍵字：芬蘭、國家地景、鄉村、符號學

壹、前言

位居北歐的芬蘭，因其特殊的冰河地形和極地氣候聞名，湖泊、森林、雪地和原野，與座落其間的小木屋所構成的鄉村景緻，早已是芬蘭國家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代表性象徵符號。冰河作用造成了芬蘭有千萬個湖泊，佔其國家面積的十分之一，是歐洲最大的湖區，而有「千湖國」之稱。而芬蘭的北國風情更以其北極圈雪地活動為代表：如耶誕老公公乘坐馴鹿拉的雪車、或哈士奇狗拉的雪橇穿梭在芬蘭的原始森林中都是極具芬蘭國家意象的景緻。因此，地景的概念指涉的不單只是某個具體有形的區域，更是其所連結的文字或藝術美學的意象。地景的概念超乎自然界限的概念，所牽涉的意象是在於人們的經驗中。

目前，芬蘭是有官方選訂的「景點」或區域為「國家地景」的少數國家之一。從符號學分析的角度來看，國家地景意象的呈現可以視為一種想像的符號系統 (signifying system)，其再現了論述 (芬蘭) 國家的概念性空間。而符號學研究更有興趣的是，探討上述芬蘭鄉村地區的地景意象如何構成國家意象的部分；也就是，對於看似為一種慣例，看似一種既成的事實真理的特定的符號展現進行論述分析，更進一步探究隱藏於其後的社會和歷史起源，而這是本文所的研究目的。這樣的角度的其實也是受到芬蘭符號學研究的啟發。

因此，本文首先將說明芬蘭符號學研究的發展，與芬蘭國家地景研究的符號學研究特色。隨後，由於芬蘭位居於兩大強鄰 (瑞典、俄國) 之間而飽受其統治威脅，芬蘭有其民族運動的歷史，而地景則是其間芬蘭人所欲凸顯代表芬蘭民族／國家的認同象徵之一。因此，本文扼要說明芬蘭 19 世紀的民族運動，以為下一小節的背景說明。接著，本文就芬蘭民族運動開展以來的國家鄉村地景意象的發展，依民族浪漫主義時期、芬蘭獨立後、二次世界大戰等階段說明。最後的一個小節，本文將解析民族運動的條件似乎不復存在，而當今芬蘭的社會經濟發展已獲得了國際認同的情境下，

傳統的鄉村地景卻依然是芬蘭國定國家地景中的要角，有何特殊意義。

貳、芬蘭符號學研究與國家地景分析

一、芬蘭 - 烏戈爾語符號科學研究的發展

國際符號學研究的發展可說從 1960 年代開始，隨國際符號學的主要趨勢和用語，芬蘭符號學即跟著發展。符號學，Semiotics，此一用語同時源自俄國學術語言。屬芬蘭－烏戈爾語系的芬蘭，符號學的用語 semiotika 這個用語來自英國－德國－俄國傳統，一般使用的芬蘭語中沒有符號學或符號學習的特有用語。這不同於一般認為的符號學傳統是法國結構主義之一，即使芬蘭符號學家與法國學派間關係相當密切。同樣是芬蘭－烏戈爾語系的匈牙利，其符號學（szemiotika）是學術用語，直接來自俄國莫斯科的塔爾圖學派（the Moscow-Tartu school）的早期作品，具有國際的參考架構，且是有點老派的用法。匈牙利用語最終屬於美國符號學（皮爾士的）傳統，但帶有俄國語的中介理性的色彩（Tarasti, 1999）。

芬蘭符號學協會由 Eero Tarasti 於 1979 年發起成立，以赫爾辛基為主的芬蘭符號學研究出現於晚期法國結構主義，並和俄國的塔爾圖學派保持相當的聯繫。Tarasti 可謂是當前重要的符號學家之一，他於 1971 年出生於前蘇聯，後來移居法國，1960 年代開始了語言學和語意學的研究，提出了符號學研究作為人文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的理念。Tarasti 所領的導芬蘭符號學協會的會員數及研究主題的範圍成長快速，現在，芬蘭符號學可謂是歐洲最有組織的全國性組織，此趨勢已經獲得所有可能國際性的承認。此外，在 1985-1988 年間的國際符號學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 IASS）中，也與愛沙尼亞、俄羅斯、北歐、美國、法國以及其他學派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台灣於近年來，都有學者參國際符號學會舉辦的大會及研討會。

芬蘭的符號學以及應用展現在許多面向：音樂、文學、戲劇、電影和藝術、歷史、政治、哲學等社會文化的符號學分析（李韋翰，2003）。並衍生出社會符號學、生態符號學等等專門領域。當前芬蘭符號學由於其跨學門的期刊 *Semiotica* 而出名，該期刊於 1982 年首次出版，Eero Tarasti 的 *Johdatusta semiotiikkaan*（1990）一書；以及芬蘭符號學協會的《通訊集冊》（由 Tarasti 所編輯），和 *Merkkien Kronikka*（Imatra, 1991）都是芬蘭符號學的代表性刊物（Tarasti, 1999）。

1960 至 1990 年間似乎是歐洲、美國以及其他地方符號學研究的新黃金時期，發展制度已經穩定。雖然符號學的拓荒者／先驅學家逐漸凋零，一些老派的符號學漸漸消失，如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原始形式已不存在，然而新的中心和學派興起，而芬蘭符號學似乎成爲世界上的重要領導學術重鎮之一，可預期的是芬蘭－烏戈爾的符號學將帶給全球符號學研究的新刺激。

二、國家地景與符號學研究

人類社會、自然與環境間的關係的理解，可藉由對於其象徵體系的解構獲得認識。符號學是對於社會文化中符號與符號系統的研究，符號學是一個用以詮釋文化創造的分析、批判工具。從符號學研究來看，國家地景（national landscape）是具有國家民族代表性象徵功能的資源，符號學探究、討論哪些關於國家地景想像的要素，不同想像之間的消長和變化現象。符號學將探討哪些國家地景的再現（representation），其符號意義產製的持續過程。所有的社會文化現象都可視爲是符號的集合體或稱爲「文本」；因此，文化地景，如地方意象或文本中的鄉村想像都可以是符號學解釋下的創造／產物。簡單來說，符號學強調「指意過程」（significance）指的是「某物」（something）用以代表「某事物」（something else）的過程；例如，社會符號學則是研究符號以及社會背景脈絡：意識型態地挑戰符號系統和日常生活的物質文化之間的連結。例如，「意識型態」是促進某一

特定團體、階級或社會，其利益和統治的任何價值、信仰和規範系統。也就是，符號學研究一個物體被視為符號並被賦予意義的社會過程（Hopkins, 1998: 68）。

關於地景的概念的發展，Hirsch（1995）提出，地景的概念和和三組概念有關：空間／地方、內／外、意象／再現的概念有密切關係。地景的第一組概念（空間／地方），指涉關於這個空間或地方，每日生活的情境、形式或經驗。地景的第二組概念（內／外），指涉關於內／外的界限、區別和認同的建立（Newman & Paasi, 1998）。地景的第三組概念（意象／再現），指涉媒體、文獻傳播之集體的再現，其中符號所展現的情境和形式。這三組概念並非獨立的，而是互相糾結交織的。類似的分析也見 Keisteri（1990: 46-52）；她在〈地景概念的多層次模式〉一文中，說明並討論當代地理學的「地景」概念，並提出入了三種「觀點」：（1）人類觀察者所能觀看到的，**實體**的地景或地區；（2）此地人們心中所喚起的，地景的**經驗／體驗**；（3）形塑該地景的**產生作用的過程**。Keisteri 研究文化地景的改變而發現，地景是可見的區域，為人類觀察者所感知，包含了對這些區域的心理經驗／體驗，以及召喚的基本過程。自然的和人類的之間的所有互動過程，反應以及主張，是研究地景時必須分析的動態過程。

隨著地景的研究的發展，地景研究也從單純的描述性陳述，走向更為複雜的地景的政治經濟分析（Hägerstrand, 1995），而這個觀點更適用於國家地景的分析上。例如，Greider 和 Garkovich（1994: 1）曾解釋地景為「被人類賦予自然意義的活動，所創造出來的象徵環境」，地景的形成涉及特定的觀點，藉由篩選特定價值和信念的過程，而賦予環境某種定義和形式。每個地景都代表著某個象徵的環境。Greider 和 Garkovich 的觀點，將地景視為一種文化認同的反映，是社會建構出的、而非自然發生的。這裡的重點應是，因為文化團體不同象徵符號的使用，物質環境得以提升為感知的層次。所謂象徵符號是賦予相同的物質物體，也可能因為不同的時代、觀點、信念、團體等等而賦予了不同的意義，產生了不同的象徵符號。近年

來的地景研究受到重視，在跨越不同的學科領域中成爲學術上的重要課題。而符號學的觀點來看，研究著重於地景的象徵角色、地景在權力、性別、或族群的關係的象徵角色 (Zukin, 1991; Rose, 1993; Mitchell, 1994)。

芬蘭是目前有選出的「景點」或區域爲「國家地景」的少數國家之一。芬蘭於 1992 年選出了 27 個國家地景，而其中的 8 個國家地景完全或部分位於自然保護區¹。芬蘭「國家地景」的概念可回溯至 19 世紀初浪漫民族運動 (Romantic Nationalism) 的文學與藝術，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和社會事件。在芬蘭民族主義者的文學和繪畫所製造出來的氛圍中，「地景」也逐漸被視爲國家的資產。芬蘭國家地景選出爲特屬於芬蘭國家的，再現「不同區域、最美好的自然和文化資源……國家地景擁有驚人的象徵價值……他們是維護文化遺產的靈感的資源和來源」(Putkonen, 1993)。

叁、芬蘭的民族運動與民族浪漫主義

芬蘭國家地景的形成有其民族主義的背景。芬蘭位於兩個強大鄰國，瑞典與俄國之間，芬蘭長期受瑞典統治，直到 1809 年 3 月 19 日，芬蘭爲俄帝亞歷山大一世所征服 (Finnish War)，成爲帝俄版圖中的大公國 (Grand Duchy of Finland)。在帝俄統治其間，芬蘭語才開始被當局承認。1860 年起，芬蘭的民族主義興起引發民族運動，稱之爲 Fennoman Movement，致使芬蘭與俄帝的衝突不斷。一直到了 1917 年的俄國發生的 2 月革命，芬蘭才得以藉機獨立 (蔡百銓，2004)。

在北歐國家中，芬蘭的語言則屬於烏拉語族的，芬蘭-烏戈爾語系的芬蘭語，與南邊鄰居愛沙尼亞與相近。過去在瑞典和俄帝統治期間，芬蘭的官方與文化生活的語言仍是瑞典語，芬蘭語僅在鄉村農民及一般芬蘭人社區使用。於此，相較於瑞典語作爲官方語言，流通於政治、宗教、教育領

¹ 參見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2009)。

域之間，芬蘭語則顯得屬於底層階層的，被當成是粗俗的語言。直至 1892 年，芬蘭語才首度與瑞典語並獲認同為官方語言（蔡百銓，2004）。

芬蘭語的歷史巨作是隆洛特（Elias Lonnrot）在 1835 年以芬蘭文編纂的民族史詩《卡勒瓦拉》（*Kalevala*）。這部史詩是芬蘭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發展的結果。《卡勒瓦拉》（*Kalevala*）史詩收集芬蘭人的天地創造神話、民族英雄傳說與民謠歌曲，再加以聯結、編纂、整理而成的。《卡勒瓦拉》字義即是「英雄之地」，美化與塑造了芬蘭人冒險犯難、剛毅不屈的民族性格，也是浪漫民族主義倚重來激發芬蘭的民族意識的代表。

芬蘭的民族運動除了芬蘭語獲得官方地位，也積極尋求、建構屬於芬蘭的主體性，而民族浪漫主義就是這個時期的風格與風潮，試圖以藝術作為提倡芬蘭文化認同的方式。Weston（1997: 15）認為民族浪漫主義是一種「構築國家文化認同的一個共同且極為成功的嚐試……也是對迫切需要去定義有別於前任及現任主宰國的芬蘭文化之反應」。Weston（1997: 15）同時指出，在俄帝統治期間的芬蘭民族浪漫主義具有強烈的折衷性質，「反映在介乎屬於對歐洲、芬蘭中世紀建築之關注與《卡勒瓦拉》（*Kalevala*）、Karelia 之史詩世界間之焦慮。」例如，這個風格體現在芬蘭的 Karelia 建築，一種強調芬蘭獨特地景中純粹森林聚落的建築，企圖表現人類生活和自然和諧的方式。

如前述，芬蘭「國家地景」可回溯至芬蘭的民族浪漫主義，自 19 世紀中葉的初期開始構組，一直持續到戰後的時期，芬蘭的國家地景意象呈現是相當結構性的整體。顯然，這個整體與芬蘭國家文化的相對同質性並行，一方面有民族運動強大的立場護航，也有也獲得政府核心角色的全力支持。

肆、芬蘭的國家地景的鄉村意象

地景曾在芬蘭國家的自我定義過程的幾個階段中，有不同的面貌，但都與芬蘭的鄉村（鄉間）連結，強調自然地景的特色。首先，芬蘭的地景

泛指內陸湖景觀，這是由住在海邊鎮上的講瑞典語的菁英所界定的。而在 19 世紀早期的民族運動，全景的湖景被理解為芬蘭地理上的獨特現象，並可能因此間接促成了芬蘭民俗特性的形成。接著，在 19 世紀邁入 20 世紀時，是以卡瑞里亞 (Karelia) 邊境要塞 (Urwald/frontier) 的形式呈現，卡瑞里亞的荒野 (Karelian wilderness) 則以當時芬蘭文化根源的搖籃之姿展現於芬蘭社會中。近年，則以拉布蘭 (Lapland) 在芬蘭的視覺定義重要性逐漸提升，而以最後荒野拉布蘭的形式展現。如此一來，芬蘭人作為一個國家民族，將其自身等同於自然，而且是一個荒野、邊陲的自然地方 (Häyrynen, 2000)。

一、民族浪漫主義時期

芬蘭如圖畫式的地景的出現，正符合 19 世紀中葉高漲的民族主義運動的焦慮。新的獨特地景從內陸地區被發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the Punkaharju esker (冰河丘陵脈) 以及 the Imatra rapids (急流或瀑布) (見下圖 1、圖 2)。Punkaharju 冰河丘陵脈和 Imatra 瀑布的所在地，於 1743 年後屬於俄帝，而於 1812 年由芬蘭大公國收回。這兩個地方再回歸芬蘭大公國之前，都是俄帝皇室造訪的地方。在俄帝擁有後的一個世紀，此兩處地點成了來自聖彼得堡觀光客的主要景點。Imatra 瀑布的水量為芬蘭境內之冠，而 Punkaharju 是芬蘭橫跨河道、最長最筆直的冰河，兩處都是致勝的景點。但基本上，這兩處還是有點區隔，Imatra 是吸引外國觀光客最重要的景點，而 Punkaharju 則是芬蘭人神聖的地方 (Häyrynen, 1998)。

浪漫主義民族詩人 Johan Ludvig Runeberg 和 Zachris Topelius 二者是芬蘭的地景主要宣傳者。Runeberg 是芬蘭國歌《祖國》(Vårt Land) 的作詞者，芬蘭國歌於 1848 年以瑞典語發表時，其中就有湖景作為芬蘭之地 (locus amoenus)，歌詞內容提到呼籲國民「我們的祖國……沒衝宵山峰能彼得過，沒山谷海灘能彼得過……是祖輩親開拓」。在他另一首廣知的



資料來源：<http://www.terreditinerari.it/mostraviaggi.php?codice=4>。

圖 1：the Punkaharju esker (冰河丘陵脈)



資料來源：<http://www.leetracy.com/worlddrivers/finland.html>。

圖 2：the Imatra rapids (急流或瀑布)

詩 (*Dan 5 Juli*) 中，他寫到一位經驗豐富的戰士，對這一位年輕學生，指著湖景問道，他是否能同先輩一樣護衛著芬蘭的湖景。此外，Runeberg 是最早宣揚 Punkaharju 的人之一，Punkaharju 有如圖畫似的景致，其中具備芬蘭地景兩個最基本的要素，松林和湖泊。他發現 Punkaharju 比 Imatra 更

貼近他理想中美麗和諧的天然地景。Punkaharju 鄰近一個田園式的地景，天然卻很理想型，Runeberg 認為這可謂更具芬蘭性 (more Finnish)：瀑布和急流幾乎分佈各地，而湖景環繞著冰河山脊，沒有幾個國家可以如此吹噓的 (Häyrynen, 1998)。

Topelius 於 1845 年發表在 *Finland Represented in Pictures (Finland farmstaldt I techninger)* 每個重要的遺址、城鎮、工廠，以及一些自然和農耕的地景。這些農耕地景或是與歷史事件或人物有關，或是典型的區域代表性的景觀，從大量的素材中選取出。這本書的目的在於選取芬蘭國家的許多不同地區最為美、最為顯著的圖片，整合構成為一個整體芬蘭的想像，盡可能組成國家的大自然圖像 (Häyrynen, 1998)。在俄羅斯統治的壓力下，地景可被用作是看似單純的政治寓言。Topelius 在 Imatra 將面對急流的挑戰對應比擬為要捍衛他們自由之路，使芬蘭免於受俄羅斯壓迫。Imatra 通常被再現為令人敬畏的美好自然之力，人們通常無法抗拒地想要投入的境地。

除了自然地景之外，民族主義運動重視農民以及農耕文化 (farmscape) 為國家地景的要素，是芬蘭國家認同形成的普遍概念之一，也是提倡小耕農的文化和價值觀為國家社區的基礎。早期芬蘭語文學和民族主義運動 (Fennoman movement) 一向把焦點擺在說芬蘭語的農夫人口上，特別是自有農地的農民。於是，民族運動的祖國鄉土等同於耕地，有趣的是，這個特點也反映在當今芬蘭的社會文化中，甚至後工業社會裡的都會芬蘭人。或許他們仍相信自己是屬於鄉村的，甚至是屬於邊遠地區的，而且企圖實踐農業社會的理想，儉約、堅毅和實在 (Häyrynen, 2008)。

Miroslav Hroch (1985) 民族運動研究中提到，農民在他稱之為民族動員第二階段中的重要性，在此階段，一群愛國者努力推動國家意識形態。要過度到下一個階段，例如政治群眾對國家事業的支持，沒有不先說服農民而獲得實現的。在芬蘭的，民族運動發展的第二階段，愛國者的社會背景多數都是聚集在南部大城市的都會知識份子 (Hroch, 1985)。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計畫強烈倚重在芬蘭語的推廣、在芬蘭語基礎上建立一個國家

文化、並用義務教育體統和協會活動教化說芬蘭語的農民；這樣也有助於將他們整合入政府行政體系中。民族主義運動的含意是愛國主義者、反都市主義、維持合作型態社會的傳統。他們的國家文化模式，如早期芬蘭文學和繪畫所推動的，是勞動和虔誠的農民（Häyrynen, 2008）。

因此，農民是鄉村想像的標的，而不是起源。尤其聚焦在自有農地的農民，省略去了越來越多的無地人口，他們更有政治代表的合法性。即使如此，仍是 Fennoman 知識份子，而非這些自有農地的農民，得以發表政治意見。知識份子成爲農民的代言人。當民族主義政治的內容來自底層人民，來自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其形式則源自於上層結構，亦即民族主義的概念建構（Häyrynen, 2008）。此時，農民價值觀被重新定義爲國家的，設定他們在今日的芬蘭仍保有其重要性。

檢視芬蘭國家地景意象的變革，明顯回應了 Hroch 所觀察到的民族動員階段之主要階段。瑞典或俄帝統治時期的真正芬蘭（Fennofile）菁英的愛國想像，以其理想化的距離觀看鄉村，被民族主義運動更開放的意識型態再現所取代。民族主義運動將農民描繪爲國家認同的根源。但是普遍的鄉村意象仍是單純呈現，缺少內在經驗和矛盾的再現。只有在 1918 年的內戰之後，這些才算是真正實踐，產生了農業民族主義的新意象。

二、芬蘭獨立後

芬蘭獨立於 1917 年，而從 20 世紀開始，鄉村田園詩意的迷思已是芬蘭國家地景論述重要的一環，包括有鄉村生活形態、社區以及地景等面向。芬蘭的國家想像將鄉村描繪爲純淨與真實的。就居地和民俗而言，芬蘭的根源（roots）或是所謂的芬蘭性（finnishness）是源於鄉村環境中。通常鄉村都被拿來對照人工的、衰退的、與自然疏遠的都市生活。這鄉村的浪漫化主要由民族菁英份子發起，譬如藝術家、作家和科學家，以及居住在都市、在都市就業的人們等。歐洲浪漫運動也影響了鄉村的浪漫化。

而芬蘭獨立後的意象和文學中重現了農業型態的社區理念，並藉土地

改革而得以擴展；土地改革是為平息無土地的人們而實行的，而土地改革使得這些人都成了小農。此時期的鄉村想像比較不在鄉村社會日常生活活動與人際關係的細節，而將注意力擺在農民身上，特別指農民的健康形象和在地人的範例。這個時期的鄉村想像結合教導歷史意象衰退和軍國主義意象的提升，構成了或可稱為戰前的「農業的民族主義」。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二次大戰後，芬蘭國家地景中的鄉村意象又經歷了另一次改變。由於芬蘭在戰後國家的復原和重建意象，以及伴隨的芬蘭都市化過程的結果，逐漸使得芬蘭鄉村轉變成為懷舊鄉愁的客體。1950 至 1960 年代，農業的結構性改變導致嚴重的境內遷移現象，就業者由鄉村移居至都市，這些被迫搬遷至都市的人們，選擇在假日的時候回到鄉村，以舒緩都市的緊張生活。對這些人來說，鄉村是充滿正向的意象和鄉愁記憶的地景／景致。此時，鄉村的意義並非由外來者所創造，而是由一群希望能重溫兒時景色、並於假日期間定期回鄉的人們所賦予的。於是，芬蘭在 1960 至 1970 年代掀起了大規模所謂的第二個家的風潮，多數第二個家的屋主其實會使用他們原有的小木屋。在對小木屋擁有者之社會行為的研究顯示，對於鄉村生活型態、兒時景色，以及逃離都市環境、與家人享受自然環境等的渴求，是芬蘭人季節性遷移至鄉村的主要動機（Vuori, 1968, 引自 Vepsäläinen & Pitkänen, 2009）。這些第二個家的所有權人，多屬於二戰後嬰兒潮世代的人，這些人們見證了芬蘭的都市化經驗，對他們來說，鄉村依然與兒時景色和鄉愁記憶有關。

現在，在觀光旅遊發展和宣傳下，鄉村的浪漫想像更趨多元化，賦予鄉村懷舊意象逐漸成為主流。鄉村地區的在地性與發展源起逐漸被遺忘，鄉村休閒地區成為在夏季度假的地方，或是土生土長在都會地區芬蘭人的第二個家。簡單來說，鄉村地景提供綠色、休閒、舒適的環境，鄉村想像清楚地存在於都會想像的影響之下。此時期意味著鄉村的商品化，成為毫

無政治性觀點的都會消費地區。

此外，對農業工作的浪漫想像，也在芬蘭的木屋／農舍文化中已扮演重要角色。農業工作可以勞動身體，而且有具體可見的產出結果。有能力以雙手在自有農地上建立農場的地主，仍是芬蘭文化中英雄式的迷思，並在文學或電影中一再敘述著。然而根據 Silvasti (2003)，農耕工作，例如田地裡的勞動，以及照護農場動物、建築和修補等雖然無法真正地賴以維生，這些迷思同樣被複製於芬蘭的鄉間木屋文化，小木屋的生活活動包含農事活動，提供再次體驗英雄式鄉村迷思的機會，也因此增加了人們對於鄉村住宅的興趣。

現在芬蘭的農業地景再現，在許多方面類似英國的鄉村田園詩意迷思。隨著現實的芬蘭鄉村結構在戰後的國家發展過程中產生巨大的改變，鄉村地景實際上已經大大地改變了，與田園詩意的鄉村景致再現並不相符。如 Silvasti (2003) 所述，在當前農企業的社會經濟現實，與以往令人嚮往的鄉村式農業地景之間，差距越來越大。因此，鄉村被視為可以從事耕作活動、真實工作，以及傳統鄉村生活方式的地方，此種經驗已經在耕作景觀的浪漫再現中，扮演一個更大的角色。

由歷史進程看來，芬蘭的鄉村地景似乎一點一點地喪失其象徵權力，其實不然。包括在國家面臨危難和戰爭之際，以及在其國家結構不斷改變、整合的過程中，不管是以國家機器的保護區網絡的形式，或是一種對於過去的理想化懷舊形式來展現，地景的國家性組合總是在轉折情況下一再地提起。對都市的芬蘭人來說，鄉村仍舊是一個參照的象徵架構，同時，鄉村也成為國家認同的新基礎。

伍、鄉村仍屬於國家地景

一、國族浪漫荒野情

前述在芬蘭民族運動時期，祖國鄉土等同於耕地，而此特點也仍可見於在當今芬蘭的社會文化中，甚至後工業社會裡的都會芬蘭人。有學者主張當前的浪漫荒野論述可追溯至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芬蘭國家認同的建構 (Saarinen, 2004)。如同鄉村，芬蘭的民族浪漫主義運動，將荒野浪漫化為美學地景，體現於國家認同中。芬蘭人的民族認同具有鄉村性的意識型態，堅信芬蘭人屬於鄉村，甚至是屬於邊遠地區的荒野。這種浪漫的民族主義也推動了芬蘭國內旅遊的發展，自然和荒野地景開始吸引遊客。芬蘭境內的拉布蘭 (Lapland) 荒野意象對芬蘭人而言是個理想典型。



資料來源：<http://www.destination360.com/europe/sweden/lapland>。

圖 3：Lapland

現今的芬蘭社會中，關於荒地的論述摻雜了盎格魯的觀念，特別是森林資源密集剝削的歷史在地景和人們的自然概念中十分常見，而與英美的鄉村田園詩意一致的是芬蘭人也欣賞荒野的視覺感官適意。然而，除了浪漫想像之外，不管是傳統上，乃至於現在，荒野一向被視為是每日生活的資源與實踐部份。雖然受到西方保護區主流思潮的衝擊，芬蘭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仍存在著芬蘭的古老狩獵和木雕技藝文化精神。荒野的芬蘭字

源是‘erämaa’，意味著在主流文化之外的正向地景／景致。傳統上，荒野所指涉的是一片被森林覆蓋、遠離村莊和農業土地的狩獵和捕魚區。芬蘭的文化和傳統認為荒野不是一個邪惡的事物，不是一個需要贏得的、馴服或改變的物體，也不只是一種美學的、身體娛樂和充電的來源，而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份，具生存意義的重要性。古老荒野相關的傳統仍然深植於芬蘭和北歐的文化－自然活動中、並且受重視。而且也因為北歐國家中普遍的進駐權，使得這些傳統得以普及。「每個人的權利」使得人們免費近用土地、水路、以及自然產品的採集。這種權利使許多傳統追尋得以延續。

芬蘭的荒野概念荒野也是一種浪漫的地景。如 Hallikainen (1998) 所述，當前芬蘭的荒野浪漫想像是相當原樣的、偏僻的、無人居住的、沒有道路的森林區域，泥沼、溪流和湖泊系統散佈其上。使用荒野的重要動機包含身體運動、清淨空氣、平和、靜謐，並能夠遠離每日生活的壓力。因此，芬蘭的荒野再現，一方面聚焦於地景想像，同時也強調荒野傳統與活動。就以芬蘭第二個家的現象來看，其文化的興起有兩個因素：一是此時期風潮（歐洲浪漫運動時期）的影響，二是都市化中產階級對於休閒旅遊和季節性遷移的熱忱。對於浪漫地景和自然生活方式的渴求，刺激了上述兩個因素的形成。並且，荒野地景也是第二個家旅遊的最重要的吸引力，在結構上，芬蘭有個小木屋座落於湖畔旁的森林，遠離塵囂的傳統意象。古老的荒野相關傳統被視為小木屋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部份。舉例來說，釣魚、採摘莓果和菇菌，是第二個家的屋主最普遍的戶外活動。因此第二個家在芬蘭性與自然的特殊連結中，以及現在的芬蘭國家地景中，被認為扮演了核心角色。

二、觀光消費娛樂景

近年來，芬蘭的鄉村地景和荒野漸漸成為娛樂和旅遊的環境。尤其對年輕世代，傳統消費活動（如採莓、釣魚和狩獵）的重要性已經降低，反

而是自然體驗的運動活動，如登山和健行則越來越受歡迎。此外，受到都市價值觀的影響，傳統生活活動的意義也變得更富娛樂性。雖然現今的小木屋文化所強調傳統消費活動，而與傳統的小木屋生活之鄉村式意象相呼應，娛樂性的價值在北歐小木屋文化中越來越明顯。在芬蘭，Vuori (1968) 認為，早在 1960 年代，帶有娛樂傾向的第二個家的旅遊動機中，刺激、比賽、以及極端體驗的追求的重要性早已提升 (引自 Vepsäläinen & Pitkänen, 2009)。芬蘭的鄉村也因娛樂性活動獲得再現。但是，如 Pouta 等 (2006) 所說，在夏日小木屋的採莓活動，或許是富有鄉村生活象徵性的再生運動，而不只是慣常性的消費活動而已。相較於新式的電動娛樂的活動，鄉村活動的一般再現包含了傳統消費和戶外活動。這也部分說明了傳統鄉村生活「再生」的方法。因此，芬蘭的冒險地景比較可被解釋為一般鄉村的活動地景。

鄉村意象的最近階段發展受到鄉村消費主義的影響，大多缺乏社會團體之間的緊張關係或刻意的意識型態內涵。如 Leo Marx 和許多其他學者已經說明了，自然和農業的想像基本上是都市的產物，為一種上層社會投射其視覺秩序於其外的鄉村地區。芬蘭代表國家地景的鄉村性是否會淪為布爾喬亞階級觀光消費凝視下的產物，這個問題值得觀察。

三、芬蘭國家地景中的鄉村意象

如畫像般的景致似乎是芬蘭國家意象的關鍵要素，無論如何，這些如畫般的鄉村地景提供了將國家抽象概念與鄉村社會與景觀的結合契機，同時也建構、強調了具某種特定觀點和特色的鄉村，而將其他的觀點和性格隱藏或邊緣化。從芬蘭的國家意象歷史發展中看出，國家和鄉村意象兩者都非完全合邏輯，也不是單一不變的，反而歷經了各式各樣的意義轉換過程。從芬蘭鄉村國家意象的結構看來，農業的中心地帶概念有其必要性，而且和邊境、核心地帶等類似。芬蘭鄉村意象繼續發展著，或許是藉著不同的論述維繫著鄉村地景，受芬蘭大眾支持而努力保留傳統的芬蘭意象。

陸、結語

本文的目的在於藉由分析芬蘭符號學研究傳統，以芬蘭的鄉村意象作為國家地景的案例，描繪出鄉村如何被建構為一個芬蘭民族主義地景意象的特定主題。鄉村地景在芬蘭地景意象歷史進程，以及在各階段中所扮演不同的敘事角色，也在文中一一呈現。總的來說，芬蘭國家地景有著意識形態面向，而其敘事模式也將鄉村再現視為（作為）國家本質上的核心，以反映出一個用以表露芬蘭國家獨特性、共同性的民族主義語彙。

參考書目

- 李韋翰。2003。〈音樂創作中的敘事原則研究——以塔拉斯堤的蕭邦幻想波蘭舞曲之敘事性分析為例〉《花蓮師院學報》17 期，頁 1-22。
- 蔡百銓。2004。〈從芬蘭獨立文化看台灣〉。《南方快報》。5 月 19 日 (http://www.southnews.com.tw/polit/specil/Taiwan_Yes/Taiwan_name_02/020001.htm) (2009/10/14)。
- Greider, Thomas, and Lorraine Garkovich. 1994. "Landscap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Rural Sociology*, Vol. 59, No. 1, pp. 1-24.
- Hägerstrand, Torsten. 1995. "Landscape as Overlapping Neighbourhoods," in Georges. B. Benko, and Ulf Strohmayer, eds. *Geography,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pp. 83-86.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 Hallikainen, Ville. 1998. *The Finnish Wilderness Experience*. Helsinki: Finnish 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 Häyrynen, Maunu. 1998. "Visual Symbolism and Aesthetic Constructions: National Landscapes in the Making of Finland," in Patrick D. Murphy, Terry Gifford, and Katsunori Yamazato, eds. *Literature of Nature: An International Sourcebook*, pp. 415-21.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 Häyrynen, Maunu. 2000. "The Kaleidoscopic View: The Finnish Nationalistic Landscape Imagery." *National Identities*, Vol. 2, No. 1, pp. 5-20.
- Häyrynen, Maunu. 2008. "Countryside Imagery in Finnish National Discourse," in Hannes Palang, Helen Sooväli, Marc Antrop, and Gunhild Setten, eds. *European Rural Landscapes: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Globalising Environment*, pp. 113-22. Dordrecht,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 Hirsch, Eric. 1995. "Introduction. Landscape: Between Place and Space," in Eric Hirsch, and Michael O'Hanlon,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pp. 1-30. Oxford: Clarendon.
- Hopkins, Jeffrey. 1998. "Signs of the Post-rural: Marketing Myths of a Symbolic countryside." *Geografiska Annaler*, Vol. 80 B, No. 2, pp. 65-81.
- Hroch, Miroslav. 1985.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Patriotic Groups among the Smaller European N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isteri, Tarja. 1990. "The Study of Changes in Cultural Landscapes." *Fennia*, Vol.

- 168, No. 1, pp. 31-115.
- Marx, Leo. 1964.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2009. "National Landscapes: Finland's National Emblem." (<http://www.luontoon.fi/print.asp?Section=12770>) (2009/9/20)
- Mitchell, W. J. T. 1994. "Introduction," in W. J. T. Mitchell, ed. *Landscapes of Power*, pp. 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ewman, David, and Anssi Paasi. 1998. "Fences and Neighbor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Boundary Narrative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2, No. 2, pp. 186-207.
- Pouta, Eija, Tuija Sievänen, and Marjo Neuvonen. 2006. "Recreational Wild Berry Picking in Finland: Reflection of a Rural Lifestyle."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Vol. 19, Vol. 4, pp. 285-304.
- Putkonen, Lauri, ed. 1993. *National Landscapes*. 2nd ed. [trans. by Timothy Binham] Helsinki: Land Use Department.
- Rose, Gillian.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aarinen, Jarkko. 2004. "Tourism and Touristic Representations of Nature," in Alan A. Lew, C. Michael Hall, and Allan M. Williams, eds., *A Companion to Touris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 Silvasti, T. 2003. "The Cultural Model of 'the Good Farmer' and the Environmental Question in Finland." *Agriculture and Human*, Vol. 20, pp. 143-50.
- Tarasti, Eero, ed. 1999. *Snow, Forest, Silence: the Finnish Tradition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Vepsäläinen, Mia, and Kati Pitkänen. 2009. "Second Home Countrysid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Rural in Finnish Popular Discours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forthcoming.
- Weston, Richard. 1997. *Alvar Aalto*. London: Phaidon.
- Zukin, Sharon. 1991. *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ural Image in the Finnish National Landscape

Ho-chia Chueh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io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Finland rural, consisting of lake, forest, snow, wild land and cottage, are constructed as the Finnish national landscape. The Finnish semiotics analysis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is articl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of Finnish rural image as Finnish national landscape are the main context of this article. The representation of rural landscape is, seemingly, objective formation of Finnish national landscape. However, this particular rural image is a result of the Finnish nation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 as well as nationalist movement before the WWII. Nowadays, the Finnish rural image is still a symbolic sign for the Finnish, mainly as a produc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Keywords: Finland, national landscape, rural, semiotic analysis